

把文物文献捐赠给大陆

2006年的时候,柏杨的夫人、台湾著名的女诗人张香华女士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讲了一件事情,她说柏杨先生今年身体状况不太好,几进几出医院,甚至还报过病危。她想万一发生什么情况,他的身后事应该有一个考虑。我建议她,如果能把柏杨先生的东西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一部分的话,绝对是一件大好事。

后来她来大陆,我邀请她到现代文学馆参观。她带上柏杨先生在西安的女儿崔渝生到了现代文学馆,我们给他们开放了书库和手稿库。手稿库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,因为里边的设备是很现代化的,就怕对藏品有影响。比如那里很多都是纸质的稿纸,很容易变形,也很容易发黄,我们里面有现代化的设备,温度、湿度都有掌握,这个设备比较好。当时我和时任馆长陈建功、时任常务副馆长李荣生一块陪她参观,给她讲解。她看了以后觉得很意外,没有想到现代文学馆有这么好的设备。

她回去以后跟柏杨先生介绍了现代文学馆的情况和她的感受,柏杨先生听了以后很高兴,告诉她:“那就决定把这些东西捐给现代文学馆吧。”当时在台湾,柏杨这个决定做出来,报纸上报道了,有反对者,有赞成者。赞成的人认为,柏杨先生这是一个壮举。反对的人说,你在台湾生活几十年,怎么可以不留给台湾而给大陆,甚至出现一些恶言恶语。但是在这个情况下,柏杨先生说:“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不是随意的,管他们说好说坏,甚至骂我,我也坚定不移。”

竟是最后一面

2006年12月14日,我和馆里征集部

柏杨:重回大陆真好

·周明·



笔者与柏杨夫妇合影(1988)

主任刘屏、摄影师王红,三个人一起到了台北。12月15日上午,在柏杨寓所客厅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捐赠仪式。我代表现代文学馆对柏杨先生表示感谢,给柏杨先生颁发一个人藏证书。

我们到他家门口时,张香华热情地说,欢迎老朋友。她说柏杨先生刚从荣总(台湾的医院)回家,身体比较虚弱,来客必须采取消毒措施。我们消完毒,走进他的卧室,已经86岁高龄的柏杨,插着鼻胃管安卧在床上,他看到我高兴地说:“应该我去接你,可惜我身体不能走动。”这时候我赶忙靠近床边安慰他说:“你能回到家中康复,大家都为你高兴,舒乙、陈建功、李荣生,还有馆里认识你的一些朋友、同事都向你问好。”他说:“谢谢你们。”我又告诉他:“你向现代文学馆捐献书稿的事,两岸三地及海外华文报纸都刊登了消息,影响很大。”他却风趣地说:“感谢你们看得起我。”

当时到台湾没有三通,回来的时候要从台北坐飞机到香港,然后在香港换飞机回北京。等我们把事情办完离开台北到了香港,张香华女士就给给我来电话,她说,你们走了以后***来了。他来了以后说,柏老你在台湾

生活了60年,吃台湾的米、喝台湾的水,怎么可以不把你的东西留在台湾而给大陆呢?他是责问柏杨先生。柏杨先生给他来了一个幽默,说大陆来的人已经把东西装上船了,现在在海上,已经开船了。***非常生气,等***起身走到门口的时候,柏杨先生深情地说了一句:“我的根在中原啊!”

我记得柏杨先生跟我们聊天,他一开口便说,这件事是我们的缘分,我是不动摇的!我们谈了好多话,言谈中他强调说,希望大陆同胞多来台湾走走,能对台湾增加好印象,希望台湾人也多到大陆看看,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,这样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,等我病好了,我还想回大陆呢!

时间渐近黄昏,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。我怕影响他的休息,便起身告辞,请他先回卧室,我站在客厅目送老人,只见他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屋,突然背着身举起右手,头也不回地向后摆了摆手——谁知,这竟是我最后见他的一面。这个背着身、举着手的姿势永远萦绕在我的眼前。

真正做到叶落归根

2008年4月29日,柏杨先生过世,台湾要举办一个追思会。由于我们深厚的友谊,以及柏杨先生对我们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,馆里派我去参加这个葬礼。我们向国台办申请去台湾的事,国台办很快批准。但是台湾一直不批,最后拖得我们觉得不可能去了,结果突然有一天,批准我们明天可以去台湾。可是追思会的时间恰好是明天上午在台北举行,怎么可能赶上?后来我们又

解情况,说5月17日还有一个撒放柏杨先生骨灰的活动。这样,我们就去了,总算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意了。

5月17日那一天刮着八级大风,我们坐飞机到了台东,从台东上船,在大风大浪中,把柏杨先生的骨灰撒放在他曾经服刑十年的绿岛和台东中间的海域。我当时突然想起了柏杨曾经给我们写过一题词,叫做“重回大陆真好!”。我想要不要带他一包骨灰回大陆,真正做到叶落归根!柏杨先生是河南人,如果带回骨灰,在河南安排一个陵园,这不是好事吗?我把这个想法跟张香华说了,她说,好啊好啊,我赞成,今天他的儿女都在,可以问问他们。那天刮着大风,在船上,我趴在柏杨先生那些儿女耳朵边说这个事,争取他们的意见。他们都同意了,我就让在西安的女儿毛毛(崔渝生)带一包骨灰。

回来以后我到处找陵园,都找不到太合适的。不久我到洛阳开会,跟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(也是我的陕西老乡)说,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成,希望能帮我的忙。你能不能在河南找一块宝地把柏杨先生好好安葬?彦英很热心,他说,我回去试试。过了一段时间,他告诉我找到一个机会。上海企业家葛千松、伊华,在上海修了福寿园陵园,好像一些有威望、有地位的人,都安葬在那个陵园,他们在河南也开办了一个陵园,也叫福寿园,在郑州的新郑。经过有关方面请示,报告都同意在这个陵园安放骨灰。福寿园河南分公司老总吴正宗听说是安放柏杨先生的骨灰,立刻说,我免费,而且还给他再铸造一座像。张香华及柏杨先生的几个子女们知道都很高兴。后来开园的时候我们都去了。现在留下这样一个陵园,对柏杨先生有一个永久的纪念。(摘自3月12日《晶报》)

听钟叔河漫谈

·李天扬·

2012年盛夏,我拖着一箱子钟先生的书,第一次登上念楼,请钟先生签名。念楼者,廿楼也。钟叔河先生住在20楼,便起了这个朴素的斋号。对我这种莽撞的粉丝行为,钟先生非但不以为忤,还一再道谢你读我的书。不过,钟先生还是道了苦衷,有读者会寄一大包书来,请他签了名寄回。

钟先生说,我80多岁了,除了理发,基本足不出户,实在没有力气做那些事。拜托转告大家不要再寄书来。为完成钟先生交办的任务,我写了一篇小文章。

文章刊发后,寄呈钟先生。钟先生回信说“大文叙事如绘”,表扬了一番。当年,我在上海政协《联合时报》写一个评论专栏,敝帚自珍,把专栏文章出了一个集子,寄钟先生求正。大约我在去信里对于杂感和时评发了一通不成熟的议论,钟先生在回信里,说了重要的意见:“报人作文,乃是本分。中国现代的散文和杂文,都是在报纸上发生和发达起来的,事实如此。你说的‘杂感和时评’,恐怕也正是杂文的源头和主体。鲁迅和周作人亦均从此起步,从此取得了大的成功。当然真要取得大成功,最后就得走出杂感和时评的圈子。”

钟先生对于我这样并不熟悉的后生小子的来信,也细细作答,既令我感动,也使我不敢轻易再打扰先生。如此便过了七八年。己亥岁末,我到湖南出差,行



前,打电话请示,钟先生俯允接见,便特意在长沙多留一天,再登念楼。

聆听钟先生漫谈,是一种享受。去的那天,钟先生将登九秩。一位九旬老人,侃侃而谈两小时毫无倦容。说古论今,谈天说地,评人论事,逻辑之谨严、见解之明澈,实在令人赞叹。漫谈式的聊天,

虽然散漫、自由,但正如钟先生身为出版家、文章家所做的工作一般,其实是有一个核心思想的,那就是“启蒙”,或曰“回归常识”。

钟先生说,有些谬误说得多了,反而成了“常识”。他举了两个例子。其一,说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如何如何厉害,比现在强得多。“这怎么可能呢?我就是在民国时读的高中,只说国文吧,那时候我们班里的同学,真的能把文章写得通顺的,其实一半也不到。更不要说其他科目了。”钟先生说。其二,现在不少人把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当作国学的基础教材,好像以前读书人都是从诵读这些书开始的。其实,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的回忆录都在,他们从小是读什么的?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从小又是读什么的?很清楚么,都是经书。从前官宦人家和书香门弟的子弟,走读书而科举之路的,都是读四书五经的,考的也是经书。“三百千”之类,只是农工商子弟的识字课本罢了。

(摘自3月20日《文汇报》)

李可染的认真和天真

·邹士方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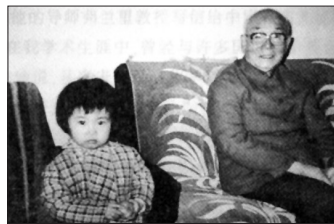
大师李可染办事十分认真。1983年《人民政协报》副总编辑张西洛命我组织一个政协委员书画版。我先到蒋兆和先生处,蒋夫人萧琼老师向我提供了蒋先生的一张画照,画的是鱼。我又去约李可染,李老说没有现成的照片,拿出一幅《牧童和牛》的立轴说:“你可以借去,拍完照片后再还给我。”当即让我写了借条,然后郑重地收起来。过几天我去归还这幅画时,他又把这张借条还给我,让我当他的面撕掉。

1983年10月,《李可染中国画展》在日本展览。1984年春节给李老拜年,他将这个展览的画册托我分别送给他的老友、我的老师——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先生。他说,画册没有余书可以赠你,我给你写几个字吧。我欣喜若狂。他立即为我书写一张条幅“金铁烟云”,边写边向我讲解“金铁烟云”的意思和出处。四个大字写完后,他又在左边写了一行小字:“论家赞李邕法书语书赠士方同志正之 可染”。他告诉我,这幅书法的价值要比画集高多了,嘱我好好保存。我真是受宠若惊!

后来朱先生托我把他的文集回赠给李老。李老说,他十分尊敬朱老和宗老,他们的学问博大精深,使他受益很多。

不要以为仁厚寡言的李老只是闷头作画,实际上他时刻注视着现实。

1987年6月13日李老在寓中同我谈起时况很愤怒。



他说:“现在许多青年画家提出反传统,不要生活,而要返回到远古去。艺术家脱离生活和传统怎么行?生活是客观现实,传统是间接生活,间接的客观。这些都不要了,不就成了主观主义、随心所欲了吗?这些论调很有害。现在的报刊为什么乱登?美术界抢山头,背后都有后台,乱成一团。我本来年近80,对外面的事不愿管,可现在社会风气太坏!售票员被人打,没人管。连起码的正义感和做人的道德都没有了。旧社会还讲‘见死不救,与人同罪’!”

他以十分尊敬的口吻谈巴金:“我对巴金很尊敬。过去抗战时在重庆一次集会上见过他。记者给他拍照,他用手挡住脸,不让照,说我是作家,你们可以看我书,不必看我的脸,不必认识我。”

1984年在李老家里,我为李老和小女抓拍了一张很有趣的照片。小女拿着李老给的一个苹果,不苟言笑,严肃得像个小大人。而旁边的李老天真地望着小女笑着,倒像个孩子(见图)。

(摘自《名人传记》2020年第3期)